

晏子春秋集釋





2 019 4813 4

吳則虞編著

晏子春秋集釋

上冊

中華書局

新學
社
PDG

晏子春秋集釋

(全二冊)

吳則虞 編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 1/32 • 23印張 • 2插頁 • 487,000字

1962年1月第1版

196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4,000 定價：(9) 3.20元

統一書號：2018·25 61, 12, 京型

新華書店
PDG

序 言

晏子春秋是記敘春秋時代齊國晏嬰言行的一部書。自從柳宗元對本書提出儒墨學派問題的辯論之後，有些人就把它看作偽書，一直不爲人所重視。我認爲晏子春秋是一部富有政治思想性的古典文學名著，很值得研究探討。下面提出我一些初步意見，就教於讀者。

一 成書年代和編寫者

本書「附錄」裏收集了有關前人討論晏子春秋的文章。關於晏子春秋成書年代和作者問題，大致有如下的三種意見：一種認爲這書是晏嬰本人寫作的，一種認爲是墨子門徒假託的，另一種說是六朝人偽造的。我認爲這三種意見都不能成立。

在晏子春秋裏有若干章節敘述晏嬰臨死和死後的事情；又，本書內一直以「晏子」相稱，可見，說此書是晏嬰本人的作品，顯然是錯誤的。

前後期墨家的人物及其著作俱歷歷可考，除了墨子非儒篇裏曾提到晏嬰之外，在其他章節裏再也看不見墨子及墨學者與晏嬰的關係，更找不出墨子門徒編寫晏子春秋的任何迹象。更顯明的是，晏子春秋前七卷內記述的晏嬰和孔子的關係，和墨子非儒篇顯然不同。何況晏嬰與墨翟以及

晏子春秋編寫者和墨子撰集者，各有其不同的階級思想，墨子門徒決不至背棄了自己階級立場而寫作晏子春秋這部書。把這書說成墨子門徒的作品，是根本說不通的。

晏子春秋在賈子新書（數寧）、史記管晏列傳和淮南要略裏都曾經被稱引過，它又被著錄在別錄和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裏。西漢時代的著作如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等書，引用晏子春秋的故實文句，現在還能見到的尚有數十條之多，這可以充分證明在西漢時代已經有了晏子春秋這部書，又怎能說是六朝人僞作呢？

我認為晏子春秋的成書，有其長期間的積累和演化過程。原始的素材可能有兩類：一類是古書（如齊春秋等）裏的零星記載；一類是民間流傳的故事（即司馬遷管晏列傳裏所提到的「軼事」）。那些古書裏的零星記載，既被採入晏子春秋，同樣地也被採入左氏傳和呂氏春秋。至於民間傳說的那一部分，也有同樣的情形。例如越石父北郭騷等故事，晏子春秋和呂氏春秋中都有同樣的材料。這類故事，由於長期間在人口頭輾轉傳播，容易發生分歧和有所增損，所以同是一個故事，在幾種不同的記錄裏，內容往往有所出入，在地名人名方面甚至還有張冠李戴的情形。正像三國故事由羅貫中根據許多史傳和民間傳說資料加以整理才編寫成三國志演義一樣，晏子春秋的編寫也是經歷了這種過程的。

那麼，問題是在於編寫的年代了。

從寫作的體裁來看，先秦諸子書中沒有像晏子春秋這樣，整部書全用短篇故事組成的。後來出

現了韓詩外傳、孔叢子、說苑、新序、列女傳等用故事組成的一些書，這些書裏就有若干故事和晏子春秋裏的大同小異。究竟它們和晏子春秋之間，誰襲取了誰，誰影響了誰，也有加以探索的必要。根據前人的考證，孔叢子不一定是孔鮒的作品；至於說苑、新序、列女傳，成書都比較晚。需要搞清楚的只有韓詩外傳一書。漢書藝文志說：「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採雜說。」所謂「雜說」，指的就是六經以外的諸子百家。韓詩外傳裏的許多材料，到今天還可以找到它的來歷，其中和晏子春秋相雷同的就有十幾處之多。兩書雷同之處，可能是外傳採用晏子。有的是整節採用，有的是片斷摘錄，和摘錄荀韓諸書的情形是一樣的。

更從引詩來看，王先謙在三家詩集疏裏把晏子春秋的引詩都說成齊詩學派，大概因爲晏嬰是齊人，他想當然地得出這個結論。其實，這是錯誤的。經過逐條研究之後，我所得出的結論是：晏子春秋的引詩與齊詩並不相同，而恰恰和毛詩同一學派（詳見集釋）。根據漢書儒林傳以及經典釋文等書的記載，毛詩傳自荀卿，荀卿授毛亨，到了毛亨才形成毛詩的一家之學。毛亨生年大概稍早於李斯（見許印林大毛公名考），比齊詩創始人轅固要早五六十年。晏子春秋的引詩既然同於毛公，那麼成書年代自然應較晚於毛亨。

再從晏子春秋本身來看，也有不少佐證，可以用來說明晏子春秋成書的時間地點。「擊缶」就是一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

王。』……」李斯諫逐客上書：「夫擊甕叩缶……真秦之聲也。」楊惲報孫會宗書：「家本秦也，能爲秦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劉孝標注陸機演連珠：「搖頭鼓缶，秦之樂也。」說文解字，風俗通義聲篇，漢書楊惲傳應劭注都說秦人把「缶」作爲樂器，這自然不是齊國的風俗了。

根據以上幾點來看，晏子春秋的成書年代，既不在毛亨之前，又不在韓嬰之後，那麼大約應當在秦政統一六國後的一段時間之內。而從擊缶等等風俗來看，編寫的地點，還可能就在原秦國境內。

編寫的年代大體搞清楚了，編寫者又是誰呢？從晏子造型、本書思想內容和寫作動機來看，我想可以找出回答這個問題的線索。

晏子春秋和先秦其他子書有所不同。編寫者並不是以講學論道者自居，書中所塑造的主人公，也不是什麼通天教主式的聖人哲人，而是一位幕僚賓客式的政治人物。假使編寫者對主人公的生活性格，沒有深切的體會，當然不會選上這個題材。

我們知道春秋時代由「士」上升的諸侯賓客，在政治上有了一定的地位，戰國紛爭，這些人物，比春秋時代更受重視，更爲活躍。可是秦統一之後，養士這回事，跟着六國的被削平而告終結，亡國的諸侯賓客，有的就投到咸陽趨附於新朝，秦便擴大博士員額（博士始於周末，秦擴大到七十多人），來安頓這班閑人。秦博士就是在這個大變動的時代被沉澱下的人物。他們坐在冷板凳上，撫今思昔，爲了表達政見，發抒心中的苦悶，有人就寫起書來了。他們既不像杏壇設

教，也不似稷下爭鳴，所以不管孔子也罷，老子也罷，一概不是他們抬舉的對象，他們所捧的角色，倒是與他們身分相似的「入幕之賓」。因此編寫者選上了晏嬰。

如上推考，晏子春秋的編寫者，可能就是秦博士了。但是秦滅六國，這位博士又是那國人呢？

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從「子誠齊人也」這句話來推考，可見齊國人對他們國家的歷史人物，是非常愛戴的。編寫者之所以取晏嬰爲主人公，除了前面所說的原因之外，他也和公孫丑一樣，夾雜一定的鄉土觀念在內。鍾儀楚奏，莊烏越吟，這種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再從資料來看，他書中所反映的齊國生活，如衣履冠帶，摩肩擊轂等等，和戰國策齊策所記敘的大致相同。晏子春秋裏又出現一些他書不經見的齊國地名（如公阜等）。此外還有一些齊國的民間傳說和齊東方言（均見集釋），假如編寫者不是齊國人士，在當時交通條件下，決不可能對齊國地理風土了解的這樣深透，情感上也不會有這樣的親切；書中對於許多史實的記載，假如編寫者不是在齊國政治上，有過較高的地位，又不可能見到這類的官府檔案和歷史文獻。由此種種，這位博士，必定是一位齊國的故臣。

可是這齊國的故臣又是誰呢？

始皇本紀裏說：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越進諫（據李斯列傳補）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以古非今者族。」

那進諫的淳于越既是齊人，不就證明有一些亡國後的齊國故臣當了秦朝的博士嗎？事情既是這樣地巧合，那末，有必要從淳于越的事迹再作一番考察。

秦始皇二十六年齊亡。滅亡的原因，戰國策和史記都說由於齊王建沒有聽從賢臣的意見。但是並沒有說出這賢臣是誰。我在淮南子泰族訓裏找到了答覆。它說「齊王建信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這淳于越與三十四年進諫始皇的那位博士，正是一人。既是一人，在此，有必要

把淳于越的事跡，與上面所推測的種種，再來逐項對照一下：

一、晏子春秋成書在秦統一六國之後，淳于越的入秦又正當其時。

二、淳于越本是齊國的高級幕僚，齊亡入秦，又當上秦國的博士。與上面所推測的編寫者的身分相合。

三、淳于越是齊人，當然熟悉齊國的歷史，看到過官府資料，聽到過流播民間種種關於晏子的故事傳說。

四、淳于越所提出的「師古長久」，和晏子春秋裏「毋變爾俗」（雜下十九）「重變古常」（內雜上七）的思想，又相互一致。

五、晏子春秋中的諫議帶有託古諷今的意味，又正是李斯所說「各以其學議之」的「議」。

據上五點，正是「不說不像，越說越像」。雖然由於缺乏直接的記載，還不敢肯定晏子春秋的編寫者一定就是淳于越，但是很有理由論證晏子春秋的成書，極有可能就是淳于越之類的齊人，在秦國編寫的。

二 思想內容及學派

晏子春秋一書主要記敘了齊國晏嬰的思想言行，其中當然也包含了這部書編寫者的一些思想感情。

晏嬰所處的時代，正當奴隸制到封建制的過渡初期。齊國是處在負山面海一片大平原上的決大國，經過太公望開國時期的經營，又經過管仲時期大力發展，就春秋社會總的發展情勢來看，齊國在當時是居於先進的地位。戰國策齊策和史記貨殖列傳裏都有這方面的記敘。可是到了莊公之後，腐朽的奴隸制，已經阻礙了生產發展，更由於奴隸主的窮奢極侈，籍重獄多，給人民造成嚴重的災難，齊國社會出現了不少的悲慘景象：道路有死人，嬰兒乞于途。這時，舊的奴隸制度瀕于崩潰，新的封建制度開始形成，晏嬰所處的時代，正是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歷史階段。

首先從奴隸主向封建主轉化的，在齊國要算是田氏。田氏是齊國新興的得勢的大夫，爲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經濟政治勢力，田無宇經過兩輩人的努力，在經濟政治上作了許多的改革，減輕了對奴隸的剝削，改善了奴隸的生活，招徠了遠方流入的勞動力，這些作爲，獲得了人民的擁護。「公室驕暴，田氏慈惠」，「政去公室，民思田氏」，田氏和公室成爲一個鮮明的對比。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國之都市，屢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煨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僂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

歸之，民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內問下十七）

除此之外，在左傳和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也有同樣的記載。從這些材料來看，晏嬰在當時，也已經看到了田氏新興勢力的成長，對自己階級命運的威脅。但是，由於他出身於貴族，長期為奴隸主運籌帷幄，所以，他在政治上和莊公景公站在同一立場。在這新舊交替的歷史時期，晏子不敢迎接這新興的勢力，而是處心積慮地為垂死的舊制度掙扎，希望能夠挽救這奴隸主的「季世」。由於晏嬰的階級立場的局限，他把田氏的强大，只片面地理解為大斗出小斗入的手段起了決定作用，因此，他的對策，也只是在這方面去下功夫。

他首先希望利用禮來約束田氏。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晏子對曰：「……臣請陳其為政：君彊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而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字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卽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外篇七之十五）

從這段問答中，可以看出晏嬰尙禮的政治目的了。他希望利用維護奴隸主統治的「禮」來保障「君彊臣弱」，來防止「臣富主亡」。具體的說，即是希望把田氏限制在「大夫不收公利」的範圍之內，同時，不允許公卿大夫擅自進行變革，以討好於人民。晏嬰又知道這個「禮」畢竟是行將過時的虛器，「做戲無法，出個菩薩」，這個菩薩並不見得威靈顯赫，又必須在政治經濟等實際方面，提出挽救頹勢的具體措施，薄斂即是其一。

……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蠶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醢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內諫下十九）

他一再向景公提出減免賦稅的意見，如諫美長座（諫下六），諫築路寢之臺（諫下七），諫大臺之役（諫下八），都是反對齊君對人民財力人力的榨取掠奪。又大聲疾呼提倡節儉，自己長期間過着刻苦樸素的生活，以實際行動來影響和改變統治者窮奢極侈的生活方式。

與薄斂相輔而行的是省刑，晏子春秋中關於這一方面的內容，佔有相當大的篇幅。例如諫誅駭鳥野人（諫上二十四），諫誅圉人（諫上二十五），諫誅犯槐者（諫下二），諫囚斬竹者（諫下三），諫誅搏治之兵（諫下四），諫誅斷雍門之櫺者（外篇七之九），以及籍重獄多之諫（諫下一），誦貴屨賤的答問（雜下二十一）等等，都是要求齊君不要過分殘殺奴隸及其他勞動人民。他更嚴正地向景公提出了「民誅」的警告。

景公游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諫上十三）

晏嬰主張省刑薄斂，提倡節儉，從減輕人民負擔，保全人民生命來看，對人民是有好處的，但是這些措施並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辦法。在整個社會面臨巨大變革的情況下，點點滴滴的改良，枝枝節節的「仁政」，不但不能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反而起了阻礙進步的作用。因此我們對於節儉薄斂等措施，固然不宜完全否定，但是也不能作出過高的估價。至于「民誅」問題，和孟子「聞誅一夫紂矣」及「善政得民」的思想有點接近。晏嬰看到奴隸主對待奴隸十分殘忍，認為如果不改變這種情況，惟有激起更大的奴隸暴動，一定和桀紂一樣，自身會遭到毀滅，提出「民誅」的警告，其目的不是爲了鼓動奴隸起義起來誅君，而是向統治者敲一下警鐘，使統治者覺悟過來，避免「民誅」的危險。如同孟子的提出「得民心」，是在怕「失天下」的前提下，想出這個方劑來進行預防一樣。當時的景公，正處於「民思田氏」逆勢之下，衆叛親離，一天天的孤立，惟有行一點善政，爭取羣衆，才能收拾已失的人心，鞏固自己的勢力，限制田氏的迅速發展。我

不同意某些人說這是有什麼民主精神，而認為這不過是晏子與田氏鬥爭的策略之一。而這種策略一直體現在晏嬰幾十年政治活動之中。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從歷史發展方向來看，晏嬰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而不是進步的。

可是，話又得說回來，上面已經提到晏嬰在某些方面，有開明的一面，不宜完全否定。除此之外，他又反對「朝居嚴」，而要求上不驕下不痞，更提出「和」「同」的問題，主張用它來調節統治階級內部關係，並要求統治者適當地聽取來自下層的意見，像這些主張，也是值得珍視的。這似乎比子產不毀鄉校更有進一步的積極意義。春秋時代，晏嬰和子產叔向都是有名的政治人物，在歷史上起了不同的作用，大體說來，叔向是保守的，子產是進步的，晏嬰則兼有叔向子產的兩重性。他在政治方向上，是叔向的同路人，在開明的一面，却又具備了子產的「惠人」風度。這「惠人」當然是革命鬥爭形勢下被逼出來的，但畢竟是在當時不多見的。晏嬰事跡之所以在人民口頭流傳，這種「惠人」風度，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處在暴政之下的人們，更容易引起對這位「惠人」的懷想。

晏子春秋的編寫者，可能就具有上面所說的這種心情。當時秦始皇爲了對內統一，對外發展，橫征苛斂，比景公更厲害。始皇臨朝的威嚴和對臣民的嚴厲統治，更是歷史上少有的。這一位齊人，處在這種環境之下，他希望也有像晏嬰這樣的一個人替臣民說幾句話，來一點「惠人」之政，因此此在書中除了記述晏嬰的事跡、思想之外，字裏行間，也流露了編寫者自己的一些思想願望，而

不祇是客觀的複述。

王充說李斯「燔詩書起于淳于越之諫」（論衡語增），史記李斯傳，只記了淳于越請封子弟功臣一事。如果僅此一事，我想不會惹下焚書的大禍，可能淳于越另外還有什麼諫議，可惜文獻無徵。但是就從這一片斷的記敘裏，也可以看出淳于越和當權派的法家是處於對立的立場，這個對立，又正是政治思想的分歧。作者宣揚晏子「重變古常」，很有可能以此為藉口來反對法家的變法改制，那麼，李斯所說「道古害今」，又是針鋒相對給淳于越的反駁與打擊。法家的思想與作為，在當時是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是進步的，那麼淳于越當然是政治上的逆流，應該批判的。可是秦始皇的嚴法重刑，從記載上看，他並不只是用來打擊奴隸主殘餘，也用之於鎮壓人民。晏子春秋作者假晏子諫殺等故事，呼籲省刑卹民，這方面，倒也可以補偏救弊。「聾」「瘖」與「同」而不「和」的問題，在秦極端專制的統治之下，是政治上相當嚴重的缺陷，「指鹿為馬」，即是「聾瘖」發展的必然結果。作者假晏嬰的幾段話正打中了秦專制政治的要害，同時也反映了當時臣民開放言路的要求。從以上這些看來，晏子春秋作者不但與晏嬰身份地位相似，其思想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說到這裏，連帶地澄清一下所謂學派爭論問題。漢書藝文志將晏子春秋著錄在儒家。柳宗元以後，有人說是墨家，又有人說是小說家，四庫總目提要，改列在史部傳記類。儒家學說的建立，一般斷自孔子，晏嬰年輩在孔子之前，那時並無所謂儒者之業，可見列入儒家學派不一定恰當。墨子尚儉，晏子也尚儉，兩書相同之處只此一端，憑此一端劃入墨家，也不合乎事實。何況

墨子的尚儉和晏子的提倡節儉，其目的和作用，又並不相同，更不能看做一個思想體系。晏子春秋確是一部古典短篇小說集，但是今天文學上的小說和漢書藝文志裏的「小說家」並不是同一概念，把晏子春秋看成一部小說集，是可以的，如果歸進漢志的「小說家」，又是不倫不類。四庫總目提要要改入史部，可是晏子春秋裏所記敘的晏嬰，並不完全是歷史上的真實，既算不得是史，因此也不應該歸入史部。以上四種分類法，都不一定恰當。我認為晏嬰本人的思想並沒有形成一種獨立的學派，他的思想也不屬於某一學派，因此也不能替他扣上一頂不合適的帽子。至於晏子春秋這書，本來是一部富有政治思想性的文學作品，應屬於記敘文學類，如果被套上另外的框子，倒使這書的性質模糊起來了。過去學派問題的爭辯，只是圍繞着漢書藝文志和四部分類的圈子兜得團團轉，並不能解決什麼實質問題。

三 藝術特徵

晏子春秋是一部富有政治思想性的古典文學作品，也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說集，也可以說是一部最早的「外傳」「外史」。

在這部書裏，作者一方面暴露了古代社會統治階級的種種黑暗面，刻劃了荒淫暴虐的君主，助桀爲虐的佞臣，粗暴兇猛的勇士等等不同人物；另一方面，也描繪了一位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晏嬰。書裏的晏嬰已經不完全是歷史上晏嬰的真實原型，而是藝術上的典型了。